
武汉会战与持久消耗战略

王文滋

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12日安庆失守算起,到武汉失守,时间长达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战场范围包括鄂、湘、皖、赣4省。日军投入兵力14个师团,加上会战中补充人员,共约30万人。中国军队投入124个师,兵力高达100万人。这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这次会战不仅粉碎了日本妄图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战略目的,而且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武汉会战后,日军再也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作为武汉会战指导思想的“持久消耗战略”在会战中的作用,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军队是消极防御,单靠阵地战消极抵抗,结果是节节败退,最后只有弃城而逃。本文根据大量的原始资料,通过具体分析武汉会战的“持久消耗战”战略和战役战术后,认为:武汉会战中,中国军事领导集团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作战指导思想和作战方式的转变,中国军队不仅有节节抵抗的阵地战,也有主动围歼敌人的运动战和袭扰敌人的游击战,在达到消耗敌军争取时间的战略目的后,便主动撤出武汉,保存了继续抗战的实力。可以说,此役中国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战略基本上付诸实践。

一 武汉会战中敌我双方的战略部署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既有长江水路联络东西,又有平汉、粤汉铁路贯通南北。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仍在武汉。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也驻有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徐州撤退后,中国军队的主力也集结在武汉周边地区。武汉成为指挥全国继续抗战的中枢。日军进攻武汉之前,近卫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提出的《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中就强调:从政略上看,“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结合点和国共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日本军部也认为,攻占汉口,蒋政权只能遁入西南边境地区,失去中原的蒋政权可能沦为中国的地方政权,再难支撑全国抗战的局面,这时要寻找愿与日本合作的傀儡政权则易如反掌;在攻占汉口的同时占领广州,对中国的海上封锁将使蒋政权失去与外国的联系,使其无法获得外国的援助;占领了华中地区,也就是夺取了中国最主要的粮仓——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的粮食。这样一来被紧紧卡住脖子的蒋政权除了投降之外,别无选择。因此,日军对武汉会战极为重视,战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并且经几次御前会议商定后,1938年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实施汉口作战准备的第119号命令:“一、大本营企图于秋初攻占汉口。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于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向前方占据前进

田昭林:《燃烧的土地》,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

阵地,准备以后之作战。三、华北方面军为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应准备进行部分作战,牵制敌人于北方。”参谋总长也于同日下达类似命令,对战术作了指示。为达到“尽量消灭敌军”“把蒋政权逐出中原”的目标,7月中旬,华中派遣军命第二军(以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4个师团为基干)向庐州附近集结兵力,负责进攻六安、霍山,再向大别山进犯,直趋信阳,切断平汉线,迂回武汉之北,转攻武汉;命第十一军(以第六、第九、第二十七、第一一、第一一六5个师团和波田支队为基干)向黄梅、九江附近集结兵力,切断粤汉线,迂回武汉之南,从正面进攻武汉;命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二、第一一六5个师团确保上海、南京、安庆等占领区的安定;航空兵团、海军一部协同作战。武汉会战正激烈进行时,日本大本营又下达大陆第201号命令:“大本营企图与进攻汉口互为先后,夺取华南敌后之重要根据地,并切断其主要对外联络补给路线;占据广州附近要地。”由此可见,日军是企图以大包围大迂回的战略,先求从战略上截断武汉守军的退路和外援,彻底动摇武汉守军的意志,以最终合围中国的主力部队,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和使中国投降的政治目的。

蒋介石等人也深知武汉会战的重要性,认为:要粉碎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不战而胜”之企图,只有用持久战的战略一方面消耗日军的实力,一方面保存自己的军力,才能达到长期抗战,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之最高政略。南京失守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其制定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中即提出:“国军以

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1页。

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456页。

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在准备阶段,徐州会战,花园口掘堤,武汉外围与武汉核心地区的江防、湖防、陆防工事的构筑,都是中国方面为争取推延会战时间和为尔后节节抵抗所作的准备。那么如何从战略战术上组织好武汉会战呢?中国军队在上海吃过地域狭窄、优势兵力变为密集轰击目标的苦头,在南京也有过被围城中,犹如瓮中之鳖之教训,而武汉无险可守,加上城区被长江、汉水隔断,城外湖沼遍布,显然不是久战之地。所以统帅部在《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指出:“欲确保武汉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如此方可制胜,方可确保,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邻而战,则武汉对我政治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此一片焦土而已……故欲确保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这种部署,不仅有利于抵抗日军进攻,且利于武汉地区人力、物力、财力之转移,不失为明智之举。6月中旬,军委会制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也规定了以下战略方针:“守备华南海岸及华东、华北现我阵地,并积极发展游击战争,妨碍长江下游的航运,牵制和消灭敌人;另外支援马当要塞在鄱阳湖以东迎战敌人,阻止他们溯江攻向九江;在武汉外围布置主力军,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的地障与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作持久之战,特别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行动上的自由,预期可与敌人的主力作战4至6个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的能力。”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高度的机动性,利用

田昭林:《燃烧的土地》,第278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48页。

转引袁旭主编:《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地形和工事, 逐次抵抗消耗日军, 以空间换时间, 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按此计划, 蒋介石自任总指挥, 调集第五、第九战区全部兵力和海空军各一部, 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 组织防御, 准备持久作战。其具体作战部署是: 第九战区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 第一兵团薛岳所部防守南浔线, 并沿鄱阳湖配置兵力, 以南昌为基地, 以外线之势击破西进日军, 防止日军进攻南昌及迂回长沙; 第二兵团张发奎所部确保九江至瑞昌线正面, 并沿江构成阵地带, 防止日军由瑞昌西进, 直趋岳阳、蒲圻、咸宁; 汤恩伯军团控制于各重要据点之间, 以便随时策应一线作战。第五战区负责江北作战, 命第四兵团李品仙所部为右翼兵团, 利用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丘陵湖沼的有利地形逼敌取捷径攻略武汉; 以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所部为中央兵团, 布置于太湖、潜山西北山地, 相机南下侧击西进之敌; 以第三兵团孙连仲所部为左翼兵团, 控制于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之间, 利用地障, 重在阻敌迂回武汉之北; 命第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所部担任敌后游击; 以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缙绪所部为二线兵团, 策应一线作战。这种战略部署, 体现了以外线进攻为主, 阵地防御和游击为辅的战略防御格局, 总体上看, 是符合持久战的战略要求的。

二 战略上的战而不决与战役战斗 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

日本经过蓄谋已久的战争准备, 经济、军事上又都强于当时的中国, 因此, 中国军队虽进行了一些大会战, 给日军重大打击, 但到武汉会战时为止, 敌我双主力量对比并未达到质的变化, 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也尚未改变。“要在敌人战略进攻的阶段就阻止敌人向内地深入是不可能的。广大中国领土沦陷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军队

驱逐敌人出境也决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清醒地认识到日军是想通过会战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结束战局，所以中国军队必须力求战而不决。因为“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于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战争胜败之关键系于主动被动成分之多寡，我之所以待敌者，即为久战不屈，使敌愈深入而愈陷于被动”。在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武汉会战目的方针与策略指导》中决定：“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 60% 为标准，其余 40% 备作第 4 期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占武汉后，敌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得恢复实力之机会。”武汉地区虽然丧失了，但还有更广阔的西南、西北战场，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还有足以最后致敌于死命的力量。这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的：“不决战就必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该这样干。”

武汉会战的总体战略是消耗战与持久战。战略上的持久是战役战斗的速决的结果，战役战斗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上的消耗战的手段。日军分兵两路向武汉地区进攻，日军是处于战略外线，中国军队是处于战略内线，但是由于武汉外围战场的广大和敌我兵力对比大约为 1: 3，我军就可以用一部分兵力坚守阵地，大部主力置于侧翼或者二线，以几倍甚至十几倍对日军，从战场的外线，突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70 页。

吴湘相：《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 1973 年版，第 457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 65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507 页。

然包围其中孤立突出的一路，迅速歼灭它并随即脱离战场。所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强调，“特别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行动上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强调部队要有运动性，要实施外线攻势防御。蒋介石在指挥作战中也十分强调攻势作战，在致徐永昌的电文中指出，“战争贵攻击，纯取守势似非得策”。在致白崇禧的电文中也指出：“非以攻为守，转守为攻，不能保卫大武汉，无以收抗战成果，希即部署所属并咸喻斯旨，以旺盛之企图，转移攻势，努力杀敌。”当日军由黄梅、叶家集两路向西进犯，而徐源泉集团恰好处于其侧背威胁有利态势，向其中任何南北一路进攻，都可以抄断敌军后路时，蒋介石即电令白崇禧：“仰白代长官迅给徐集团以适当之任务，令其努力侧击，以收协同一致之效。”在致陈诚的电文中，他也指示：“该战区应以在后方控制及能抽调各部队，编为挺进军，不受任何情况牵制，选择敌军最感痛苦方面，断行挺进攻击，须以主力猛攻敌之背后，一部掩护主力行动，并扫荡敌军后方，协同正面部队包围歼灭敌人。”诸如此类的电文、指示很多。陈诚、李宗仁、白崇禧、薛岳、李品仙、张自忠、孙连仲等高级将领在战役中也较好地执行了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一战术。白崇禧在致蒋电文中说：“对敌之策，惟有取机动姿态，求敌侧背相机攻袭，而不限以一地一城之死守。如此，则能常保持有用之力量，获得作战之自由。”8月上旬，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黄梅，与江南日军主力相距数百公里，中间又隔长江，而远在合肥、舒城的第二军主力尚无西进

转引袁旭前引书，第158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10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24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21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64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24页。

动静,这样第六师团成为一支孤军。白崇禧抓住这一时机,决定利用长江北岸港湾密布,大别山南麓居高临下之有利地形,从侧面反击孤立的第六师团。8月16日,白崇禧命令李品仙率7个军,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并切断敌之退路,对第六师团逐次侧击,全部包围消灭。虽然由于日军火力强大,援军机动快,空中支援及时有力而免于灭顶之灾,但给第六师团以沉重打击,是役日军被歼数千人。8月上旬,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在南浔铁路沿线的山岳丛林地带巧摆“反八字阵”,诱使日军第一六师团进入包围圈后,在金官桥一带指挥部队猛烈进攻,毙伤日军8000人,击毙2个联队长,中小队长伤亡大半。该师团经几次补员后才得以成军。10月初,薛岳又在南浔、瑞武线之间引诱第一六师团再陷“反八字阵”,并成功地阻击了第一一师团和三个强大支队的驰援,在万家岭地区歼第一六师团1万余人。而整个会战中,日军未曾全歼中国军一个整师,正是通过许多次规模或大或小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国军队才遏制了日军凌厉的攻势,使武汉会战达成了“与敌主力作战4至6个月”的战略持久目的。

三 武汉会战的作战形式

前几次大会战的经验和教训,使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领导集团开始意识到单一的阵地战式防御的巨大局限性,认为武汉会战的作战形式应该是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有机结合。先拿阵地战来说,因为武汉会战是以保卫武汉为初始目的战役,且日军积极进攻,所以阵地战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只有依托阵地,节节抵抗,才能拖住敌人,消耗敌人,争取充裕的时间,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或组织退却。早在1935年夏,陈诚担任陆军整理处处长时即策划武汉的国防工事:把北面的武胜关,南面的城陵矶,东面的田家镇连成一

线,构成一条向东的弧形防御工事。经过2年多的建设,已有一定的基础。陈诚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后,就在1938年1月26日召开构筑工事会议,把国防永久工事分为十区施工,加紧建设。长江两岸也构筑了众多游动炮兵阵地。长江航道也被阻塞以防敌舰溯江而上。我军利用这些人工防御工事和大别山等天然屏障构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防御阵地,不但顽强地抗击了日军的进攻,而且把大批的日军吸引在阵地之前,从而有利于外线部队的作战或二线部队的调整。如由于白崇禧对日军第二军主攻方向判断的失误,把防御主力布置在右翼,而关键的左翼却兵力不足。因此,战区整个防御部署必须调整。为了阻敌南下,宋希濂军在富金山一带以阵地战抗击日军。从9月2日至9月1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师团弃尸7000余具也未能越过富金山大峡口。东京的报纸哀叹:“此(富金山)役由于受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毫无进展。”万家岭大捷,阵地战也有一份功劳。如10月初,第一六师团企图突围,但被俞济时部第七十四军阻击在张古山阵地前,扎住了布袋口子,使其只能固守待毙。可见,中国军队要保卫武汉,阵地战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关键是指挥者对地点、时机、部队的把握。

运动战是歼灭敌人的主要作战形式。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技术是实施运动战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达成了较一致的认识。日军采用的是大迂回大包围之战术,企图合围中国军队主力于武汉地区。中国军队只有在内线中取外线攻势,才能有效防御。军委会作战计划中特别强调了,要“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行动上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强调部队要有运动性,要

张洪涛:《中国武汉会战纪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转引袁旭前引书,第158页。

实施攻势防御。田家镇要塞失陷后，武汉门户洞开，日军凭陆、海、空之优势溯江西上，蒋介石乃电令白崇禧等人：“以五、九战区各一部兵力迟滞敌之前进，主力概转移至武汉南北两侧，待敌迫近武汉本阵地，即分别断行袭其侧背，予敌以决定的严重打击。”这里强调的就是以运动战为主的积极防御。为了使炮兵发挥“战争之神”的威力，蒋介石致电顾祝同：“战车炮及山炮应适合各种地形及运动性，适时机动，变换阵地，于敌未确定其位置企图登陆妨碍前，业已射击完了，另行变换阵地，如是，则沿江皆我炮兵活动阵地，随时可射击敌舰。”这说明，他认为炮兵部队也应该以运动战为主。白崇禧、陈诚等高级将领也比较注重于运用运动战来进行积极防御。白崇禧在部署广济和商固作战之时，致电蒋介石称：“利用大别山地，改取机动配置，正面仍以一部守御，主力集结在敌之侧背，求其弱点，相机攻击，断其后方联络线，以此广大地域，运用广大面之运动战，如此则易死路为生机，变被动为主动。”为此，他命令李品仙兵团先让出广济城，在两侧山地重筑防线，再用运动战战术分割消灭敌军。此役不但打死打伤日军精锐第六师团数千人，而且牵制了敌军主力转移，策应了田家镇要塞保卫战。陈诚部署第九战区兵力，主力置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主要也是基于有利部队机动，在运动中歼敌之考虑。日军在进攻南浔线、瑞武线的每一个战略要地时，不仅正面遭到中国守军的激烈抵抗，而且侧翼或背部也被突击或切断退路，以致进展缓慢。仅东西孤岭、金官桥、万家岭三役日军就死伤3万人左右。至于各集团军防御区内进行的外线的速决的歼灭战就更是不胜枚举。总之，武汉会战中国军队能与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20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38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24页。

军精锐主力作战4个多月,是与他们较好地实施了运动战战术分不开的。

游击战在这场大会战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呢?1938年8月21日,蒋介石在接见伦敦《每日捷报》记者时发表谈话:“战争愈展开,流动之游击队将愈占重要地位,在未来保卫武汉之决战中,游击队必将有重大贡献。”为了扰乱、疲惫、分散和吸引敌人,7月5日蒋介石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现值青纱帐起,正是游击最好时期,各该战区指定担任游击部队应积极行动,努力袭击敌人,尽量破坏交通、通信,以分散进攻武汉兵力。若认为游击实力不足时,须酌量增派,务使彻底遮断敌交通线为要。”当武汉会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蒋又电告程潜,要趁敌后方空虚之机,发挥游击战争之威力,协同武汉战场作战,他要求程潜令缪流军、韩德勤军、石友三军团、独立第二十八旅等在鲁南、豫东、皖北、豫南等地积极游击,彻底破坏交通。军委会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及指导要领》中规定:“第五战区应指定12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合、大及豫东、皖北方面挺进游击。尤须积极袭击沿江西进之敌。苏北兵团应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第九战区应以4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常常向敌后方游击。各战区、各兵团、各集团军也就游击战问题发出了许多指示,如《第九战区作战计划》中要求:“位置敌后方之游击队,积极活动,破坏敌之交通通信,增加其困难。”八路军、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各个战场上也积极以游击战袭扰日军。如从5月13日至10

转引袁旭前引书,第163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85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61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50页。

月 22 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等部队对平汉铁路、正太铁路、道清铁路进行了 10 次总破袭,比较彻底地破坏了这些铁路的运输。国共两党军队的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敌人,减轻了武汉战场之压力。日军承认:“武汉会战时,虽然大本营要求平汉路方面日军越过黄河向郑州进攻,但在山西游击战的袭扰下,终难遵命前往。国民党的中条山游击根据地曾经牵制了日军 3 个师团。”

当然,就武汉会战中游击战的总体作用来说,仍只是配合正规战的一种辅助形式。“只有在敌人占领与包围区域,主力部队不易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动的条件下,才以游击战为主”。

综观整个武汉会战过程,不难发现,中国军队既有英勇悲壮的阵地战以阻击迟滞敌人,又有规模宏大的运动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也有深入广出的游击战以袭扰敌人。三者的重心是运动战,但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机、不同的部队各有侧重,并交互使用。三者的合力产生了巨大的威力,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实力。武汉会战以后,日军再也无能继续发动全面的进攻作战。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统帅部在武汉会战中,审时度势,制定了比较适合我军的战略方针,对武汉会战战役发展和整个抗日战争产生了积极影响,日军伤亡 10 万余人,损耗大量装备,并未达到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之目的。中国军队虽然在战役战斗上也还存在许多失误,以致于自身伤亡 20 余万人,但是保存了主力,武汉周围的大别山、幕阜山、鸡公山及鄂西大部仍然在中国军队手中,且造成了围困武汉的持久态势。武汉沦陷后,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俊六大将在《关于武汉、广州两战役后善后处理的形势判断》中说:“自中日开战以来,虽给中国军队多次打击,但遗憾的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第 1 分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33 页。

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战》,汉口《群众周刊》,1938 年第 5 期。

是,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兵力,其主力仍存在。国共统一战线暂时还不会破裂。”这无异于承认,日军进行武汉会战的政略和战略目的均告失败。在此意义上,武汉会战可视为一次胜利的战役。

(作者王文滋,1970年生,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97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兵)

刘大年:《抗日战争中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95年9月11日。